編序

蔡志祥　　橫山廣子

2024 年 1 月 4 日，日本人類學家末成道男教授（1938-2024）仙游，享壽 86 歲。末成教授不僅學問淵博，也扶翼了幾代日本學者。教授在日本推動的學術交流和跨地域研究模式，和華南研究中心有千絲萬縷關係的華南研究會的成立和發展都是間接地受到他的影響。在教授冥忌的一周年，我們邀請數位和教授有深厚交往的日本學者闡述教授的生平、志業和貢獻。向這位在日本和東亞人類學界備受推崇的學者致敬之餘，我們也希望借此讓讀者稍稍認識當代日本人類學的跨域發展狀況。

緬懷末成道男教授

橫山廣子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名譽教授）
（蔡志祥譯）

一、前言

我首次與末成道男教授見面，是接近五十年前，我還是在東京大學主修文化人類學的本科生的 1970 年代。末成教授是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教養學科文化人類學分科的「學長」。當時他已經以台灣阿美族社會組織的研究獲得博士學位（1971 年），並且在聖心女子大學任教（從 1972 年 4 月到 1990 年 8 月），同時，也在東京大學教養學科兼任講師。在課堂上，末成教授不僅總是安詳地講授關於親屬組織等困難的課題。由於他已經開始進行韓國村落研究（從 1972 年 3 月），課堂上講授許多韓國的案例。他時常會給我們這些學生一些韓文的——就是漢字和助詞部分用拼音韓文寫的論文。在簡單講解韓文語法後，就讓我們嘗試閱讀論文。韓文的書寫結構與漢字與假名交錯書寫的日文類似。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漢字來粗略理解文章的內容。當時我的感覺是用從沒有學過的韓文論文來做教材，就像參加了一門專業課程一樣。

末成教授的畢業論文是根據文獻資料研究台灣高砂族（原住民）的土地所有制度。大抵，末成教授閱讀來自殖民時期日本研究者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眾多學術成果，而產生對台灣原住民研究的興趣。由於台灣自 1949 年以來一直處於戒嚴狀態，外國人很難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因此，末成教授的碩士論文無法繼續台灣研究，而是通過在日本岩手縣水澤市農村的田野調查來討論「同族」社會的問題。1965 年，末成教授在台灣的排灣族進行了他第一次海外調查研究。當時戒嚴令仍然有效，而且他是日本人的關係，因此末成教授在台灣調查研究的時候，肯定需要很多考慮和關懷。然而，教授在他的博士論文《台湾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台灣阿美族的社會組織和變化》）的序言中說「筆者要感謝石溪（調查地點）的各位。他們不僅歡迎我這個來自一個對他們的過去曾經帶來不甚美好回憶的國家的訪客，並且毫不掩飾的向我展示了他們的日常生活。」1972 年，也就是他第一次到台灣進行海外田野調查研究的七年之後，末成教授開始在韓國農村進行田野調查。

那時我剛開始學習文化人類學。為了進行海外調查研究，我們必須打好基礎，不僅要閱讀與研究領域相關的文獻，並且要具備語言能力。由於自己的經歷，因此，對於末成教授在短短幾年間就能掌握兩個在文化和語言上完全不同的地方的基礎知識和語言，實在令人驚訝。自此，我一直深深敬

佩末成教授對開拓新的田野領域的勇氣和靈活的田野技巧。韓國研究之後，直到 70 多歲的高齡，數十年間末成教授前往中國大陸和越南等地方，以比較的視野，展開深受中國漢字文明影響的東亞地區的田野調查。無疑，末成教授是一位罕見的學識廣博的人類學家。

下面，我想追溯一下我與末成教授的交往，嘗試記述關於他的學養、研究和成就的點滴。

二、末成教授和「仙人會」

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是關於東南亞內陸山地民族宗教儀式的研究。自此，我對還留在中國雲南省的同一民族的狀況，一直保持很大的興趣。然而，那個時候很難取得在中國進行的調查報告，因此，我的碩士論文重點研究有山地民族的東南亞國家中，居住在平原地區的主要民族的文化。1981 年 3 月，我在日本民族學會主辦的關東地區碩士論文報告會上發表了碩士論文提要。那一年，有很多撰寫關於中國和東南亞的論文的碩士生。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的變化，研究者期待着封閉已久的中國大陸的學術交流能夠重新開放。我們這批年輕的同志在報告會後舉行的酒會中，暢談將來的交流，決定定期舉辦研究會，這就是到今年已經維持了 43 年以上的「仙人會」。順帶一提，「仙人會」這個名字來自當時我們經常喝酒聚會的餐廳的名字，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

自 1981 年 5 月以來，「仙人會」幾乎每個月都舉辦一次報告和討論會。報告內容以人類學和民族學為主，涵蓋歷史學、考古學和文學等多個領域，研究區域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韓國、日本和東南亞等地。雖說這是一個開放的研討會，但主要還是年輕的研究者聚首一堂，匯報自己正在研究的課題或者剛從田野調查回來的見聞，從而在互相討論的氛圍下，進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一些年長的研究者，也會參加和他們的研究主題和興趣相關的報告。但末成教授很特別，他幾乎每次都會參加研討會，並且經常從經驗豐富的研究者的角度，提出尖銳的觀點和建議。

經過了多年的仙人會的積纍，1980 年代末，末成教授向我們提議，開始為中國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基礎文獻進行題解的工作。末成教授認爲我們必須跨越狹隘的、固步自封的學術領域的界綫、不要回避觀念不一樣的討論，需要從不同領域整合出中國形象，才能進一步的開展各自的研究。故此，以協作的方法完成的文獻題解對研究和研究者來説，意義深長在徵集經常參加仙人會的成員參加這計劃時，末成教授要求大家不要囿於自己的專業領域，一意孤行的書寫題解，而是集合不同領域的研究者，不論年資，率直的以集思廣益的角度，從互動的反覆討論來完善文獻題解的內容和結構。

文獻題解獲得日本文部省 1990-1991 年度的科學研究經費的資助。當時，不論遠近機構的參與者，一年三到六次，在末成教授工作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討論、深化文獻題解的內容。記得每次都會討論到黃昏。會議結束後，大家都到附近的餐廳繼續討論。

回想那段日子，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從教授的研究室移師校外的餐廳那一段路。我們十多人向着餐廳邊走邊聊時，末成教授的體力很好，總是走得很快。跟教授做過田野調查的研究生都眾口一詞認為教授在田野時也是走得很快。還有一件事，當大家在九點左右從餐廳出來，正準備前往地鐵站坐車回家時，只有末成教授朝反方向走，返回東洋文化研究所。我很驚訝他這麼晚還回到研究室工作。後來得知，在東洋文化研究所大家都知道末成教授是一大清早就到所，也是最後一位回家的研究員。

文獻題解經過四、五年的共同努力終於完成。隨後在科學研究經費的資助下，在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文化人類學文獻題解》[1]。該書由 33 人撰寫，收錄了包含中國漢族和各個少數民族的研究史的解説以及 600 條文獻的題解。

三、培育年輕的研究者

時常參加仙人會的末成教授，總是津津有味的聆聽各種報告。那時，我覺得與其説教授的出席是爲了鍛煉年輕的研究者，毋寧說是因爲他的好學心和好奇心所驅使。然而，我後來從很多方面聽到的是教授對培養下一代的研究者的意識很強。這時，我才明白以前的印象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

現在回想起來，例如 1992 年 12 月教授和當

時在東京大學人類學研究室任教的 Jerry Eades 教授共同帶領原來在東京大學學習人類學的、研究中國的年輕研究者，組織了一個題爲“Identity and Ritual in the Anthropology of China: Recent Research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kyo”（「人類學中國研究中的身份認同與儀式：東京大學的最新研究」）的研究小組，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美國人類學學會第 91 屆年會。末成教授顯然是很希望我們這些年青的研究者可以在美國人類學學會上發表我們的研究心得，同時也讓我們可以借此機會和國外的學者交流。

會上，末成教授為這個研究小組做了一個關於「日本的中國研究」的介紹報告。然後，韓敏、横山廣子、瀨川昌久、清水純、聶莉莉、三尾裕子等分別根據各自的田野調查，提出研究報告。末成教授邀請了史丹佛大學的武雅士（Arthur Wolf）教授評議。小組報告結束後，在會場外的餐廳，我們有機會與來自美國各大學的著名人類學和歷史學學者見面和交流。就我個人而言，1988 年，我從雲南完成長期的海外調查後不久，就受到在華期間認識的杜磊（Drue Gladney）的邀請，參加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舉行的美國人類學學會，並在會上發表報告。然而，在舊金山的大會我有機會和華若璧（Rubie Watson）和華森（James Watson）夫婦以及孔邁隆（Myron Cohen）等著名學者共同參加聯歡會，聆聽他們的對話。這確實令人雀躍興奮。我們的研究小組的成果，後來以英文編輯出版。[2]

在舊金山會議期間，我偶然發現末成教授在研究之外的、我以前從未知道的一面。有一天，當我下樓去吃早餐時，因爲其他朋友還沒下來，而只有末成教授在那裏，所以我們就一起在同桌吃早餐。末成教授說「我已經在飯店的周圍走了一會兒。」跟著，末成教授從桌上拿起一張餐巾紙，用原子筆在上面寫了一些東西，然後給我看。這是一首音節結構為五 -- 七 -- 五的俳句。這是一首捕捉早晨清新空氣的俳句。當我感到驚訝時，他說：「我經常創作俳句。」我這時才知道在東洋文化研究所潛心研究的末成教授也有這樣優雅的嗜好。

在早餐桌上，我們還談論了我從雲南省白族村莊收集到的家譜的問題。我對末成教授說雖然我知道白族的家譜跟漢族的有一些區別，不同地區的漢族的家譜也有所不同，然而對於漢族家譜沒有全盤瞭解的我來說，我很困擾，不知道可以怎樣進一步深化白族家譜的研究。從美國回到日本不久，我收到了末成教授的邀請，他說：「不知道横山小姐妳有沒有興趣參加一個關於越南的家譜和其他漢文資料的讀書會？」這是 1992 年夏天末成教授開始在越南進行田野調查之後組織的讀書會。

這個讀書會在末成教授領導下，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舉行。每次的讀書會只有 3 至 4 人參加。除了末成教授和我外，其他都是東洋史出身，專門研究越南的學者。從越南收集到的家譜和白族的家譜有不少差異之處。然而，有趣之處是越南和白族兩者都是處於中華文明的邊緣地方，故此，也許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一些共同點。再者，讀書會是以東洋史研讀的風格來閱讀越南的家譜。對於沒有東洋史學者處理漢籍經典訓練的我來說，這是一個令我振奮的嶄新的鍛鍊場。

1994 年 4 月開始，我轉職到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因此，能夠參加該越南漢文資料讀書會的期間較少。然而，讀書會的經驗，讓我更加仔細地重新審視了我一直在收集的如與白族有關的地方志等漢籍資料，為我的研究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

末成教授在熱熾追求自己的研究興趣的同時，也提携扶翼了不少年輕後學參與相關的研究。在此，對教授的學術眷顧，無盡感恩。

四、包容性的學習研究平台

從 1960 年代到 2010 年代，末成教授從未間斷田野調查。他的田野調查範圍廣濶，涵蓋日本、台灣、韓國、香港、中國大陸和越南等地。末成教授以跨文化的比較視角，展開對東亞研究的深度研究。他的研究標題，有不少是比較兩個或三個的地域。[3] 即使是對特定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的討論中，也時常可以窺見他對其他地方的見解看法。教授在各種研究會上的發言也是如此。即使在一個主要是年輕學者組成的研討會中，末成教授也不會以自己爲中心強牽帶引的左右討論，而是坐在會場後面，仔細聆聽參與者的討論，並且根據報告所討論的地區與不同地域的田野調查所得，提出適當的評論。

我相信末成教授的素養和對學問的取態很像他的摯友王崧興教授。王教授突然過世後，末成教授主編了《中原と周辺——人類学的フィールドからの視点》（《中原及週邊——人類學田野的視角》）[4] 一書，紀念王教授。

從末成教授以「仙人會」成員為骨幹編輯出版的中國研究文獻解題，及以相似的具體方式推動其他東亞地區的研究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他的領導力和組織力。

台灣研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92 年在台灣順益基金會資助研究的契機下，末成教授組織了「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後改稱臺灣原住民研究會）」。教授利用經費，在理解台灣民族文化以及日本研究者的台灣調查研究的歷史的背景下，指導研究會的成員整理和出版與原住民有關的口述傳統、攝影資料，以及日本研究者的過去調查等研究資料。其代表性出版物之一是《台灣原住民研究概述——日本視角》[5]。該書包括了研究史的解說和主要文獻題解。此外，1996 年《台灣原住民研究》創刊，以定期的學術期刊確保研究成果有持續發表的空間，並且借此促進台灣研究群體的交流和發展。

末成教授認爲設立研究會以及編纂文獻解題需要群策群力。出版各該領域的文獻題解等重要書籍，並且以學術期刊作爲發表調查研究成果和活動資訊交流的平臺是建立各該領域的研究基礎和促進維持研究群體的重要方式。在末成教授的領導下，越南研究方面也是用同樣的（1）設立研究會、（2）出版文獻解題等書刊以及（3）創辦學術期刊等具體方式推動。

末成教授在上述的研究平臺的建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為研究者彼此的密切互動交流、擴展研究空間、把學術研究推向更高的層次等，做出了巨大貢獻。值得注意的是，教授一開始就意識到這樣的空間平臺必須具備包容性、超越國籍和文化背景。由末成教授領導的東亞比較研究的結晶之一包括《東アジアの現在——人類学的研究の試み》（《東亞的現狀——人類學研究的嘗試》）[6]。本書由各作者以自身的母語撰寫研究報告，並且提供日語、英語、中文、韓語和越南語的摘要。如此具有開創性風格的書之所以能夠出版，主要是因為除了 11 位作者之外，末成教授還募集了大量的合作者來進行翻譯工作。此外，必須指出的是末成教授雖然以理想為目標，但並不盲目追求完美。他會根據情況做出適當的選擇，從而義無反顧地走向目標。末成教授建築的研究平臺，是讓各個人都可以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互動交流的地方。

末成教授所規劃的平台的包容性不僅限於研究者，它還包括與研究對象的對話。這一點在他晚年所公開發布的映像記錄中可以深刻體現。末成教授富有積極進取的精神，對新設備和新科技非常感興趣。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他帶著 8 米厘膠片攝錄機跑到田野。後來，隨著輕型的錄像機的出現，教授更加積極的在田野調查中拍攝錄像。1990 年代開始到越南進行田野調查研究時，相對於靜態的攝影，教授更傾向動態的錄像。隨着攝影及播放器材的普及，越南人越來越接受田野調查者的拍攝和錄像，教授同時意識到把拍攝影像向調查對象公開的必要性。末成教授在 1994-97 年間參加了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共同研究計畫「新しい視覚情報開発のための民族誌映画の分析と活用」（「開拓新的視像資訊：民族誌電影的分析和利用」），並根據在那裡獲得的知識，製作了「越南的婚禮」和「ベトナムの祖先祭祀──潮曲の社会生活」（「越南祖先祭祀──潮曲的社會生活」）兩套影片光碟。教授指出，以影像結合文本的嶄新的，有別於傳統的書寫，是很有意義的新的民族志表現方式，這樣的民族志不僅可以用作教材，還可以回饋當地社會。[7] 末成教授戮力建立的各種平臺，為面對當代問題的人類學家，提供了豐富的意念和方案。

五、小結

以上關於末成教授的一些回憶中，令我聯想到我和末成教授的指導老師中根千枝教授的一番話。談到什麼樣的人最適合成為人類學家，中根教授曾經說：「不是一個總是處於聚會中心的人，而是能夠離開中心站在一旁的人。這樣才能把種種式式的事物看得清楚。」末成道男教授正是在不同的舞臺上的謙厚而又能夠洞察事物的學者。我謹向末成教授致衷心的感謝，並祈禱他的靈魂安息。

註釋：

1. 末成道男編，《中國文化人類學文獻解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
2. Suenari Michio, J. S. Eades, Christian Daniels, eds.,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Views from Japan*. Canterbury: Centr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Computing, University of Kent, 1995.
3. 末成道男，〈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漁村の特色——日韓 3 集落の事例を中心に〉，九学会連合日本の沿岸文化調査委員会編，《日本の沿岸文化》。東京：古今書院，1989，頁 264-274；末成道男，〈韓国と中国漢族の大リニージの比較〉，杉山晃一・桜井哲男編，《韓国社会の文化人類学》。東京；弘文堂，1990，頁 103-122；末成道男，〈東アジア三社会の葬礼に見られる異質性〉，溝口雄三編，《漢字文化圏の歴史と未来》。東京：大修館，1992，頁 177-189；Michio Suenari, "Unilateral Kindred: A Reconsideration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In Mutsuhiko Shima & Roger L. Janelli,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Korea: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Tokyo: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998,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49, pp. 139-156.
4. 末成道男編，《中原と周辺——人類学的フィールドからの視点》。東京：風響社，1999。
5. 日本順益台湾原住民研究会，《台湾原住民研究概覧——日本からの視点》。東京：風響社，2001。
6. 末成道男編，《東アジアの現在——人類学的研究の試み》。 東京：風響社，1997。
7.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民族誌のマルチメディア的形態をさぐる——大森康宏教授「新しい視覚情報開発のための民族誌映画の分析と活用」プロジェクトに参加して〉，《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2003，卷 35，頁 31-35。

追悼末成道男教授

清水純（日本大學特聘教授）
（蔡志祥譯）

末成教授是我在東京大學文化人類學研究院的學長。我的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得到末成教授種種形式的影響和指導。我還是大學本科生時，當時在聖心女子大學工作的末成教授曾經以兼任的身份，在東京大學駒場校園講授社會人類學課程。課程主要是導讀《馬淵東一著作集》。然而，當時我對社會人類學還沒有很大的興趣，而且馬淵東一的文章很難讀，所以就沒有選修這門課程。和末成教授的研究交流，是我進入研究院後，通過「仙人會」才開始頻繁起來。

一、仙人會的活動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中國的開放政策，在日本研究中國民族文化的熱潮日益高漲。1981年，我在研究院攻讀碩士時，日本的幾所大學的一些對中國有興趣的年輕研究生組織了一個名為「仙人會」的研究會，我是其中一個成員。我們每個月在不同的大學借用教室，讓來自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和文學等不同專業的成員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研究會組成不久的某一天，末成教授默默的進來、隨意的坐下，聆聽同學的報告。當時我覺得很詫異。末成教授的年齡比我們這一代的研究生大得多，而且已經是教授級的身份，為什麼還會參加像我們這樣的青年朋友的研究會？我甚至認為參加這樣的以年輕學者為中